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

Marx's Discourse with Hegel

[美] 诺曼·莱文 (Norman Levine) / 著

周阳 常佩瑶 吴剑锋 任广璐 / 译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Karl Marx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

Marx's Discourse with Hegel

[美] 诺曼·莱文 (Norman Levine) / 著

周阳 常佩璐 吴剑锋 任广璐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 / (美) 诺曼·莱文著; 周阳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05-2

I. ①马… II. ①诺…②周…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②黑格尔 (Hegel, Georg Wilhelm 1770—1831)-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A81②B516. 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389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

[美] 诺曼·莱文 (Norman Levine) 著

周阳 常佩瑶 吴剑锋 任广璐 译

Makesi yu Heige'er de Duihua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6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5 000

定 价 8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课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我上一本书是献给我所有子女的，当前这本就该献给我的所有孙子、孙女了：

本杰明·阿里 (Benjamin Ari)、阿伦 (Aaron)、本杰明·马克斯 (Benjamin Max)、麦迪逊 (Madison)、萨拉 (Sarah)、埃玛 (Emma)、丽贝卡·路易莎 (Rebecca Louisa)、艾丹 (Aidan)、雷切尔 (Rachel)、梅根 (Meghan)、凯蒂 (Katie)、迈克尔 (Michael)、卡西迪 (Cassidy)。

希望孩子们能循着他们父辈的足迹，再创未来。

致 谢

我要向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艾恩伍德（Ironwood）公共图书馆表达我的谢意，在我创作这本书的六年时间里，它为我提供了一处宁静的港湾。这座图书馆所提供的安静、私密和包容的工作环境是我完成这部手稿的前提条件。

我还要感谢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的朴雅卡·吉本斯（Priyanka Gibbons）和理查德·鲍曼（Richard Bouwman）。我的书得朴雅卡·吉本斯青睐，实在是荣幸之至。理查德·鲍曼则是一位不知疲倦、完美无缺的编辑，《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一书得以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正是靠了他 X 射线般锐利的编辑眼光。作为拥有最终解释权的作者，对本书错漏之处，我将负全部责任。

还要感谢罗丝（Rose），她一直是我灵感的来源。

诺曼·莱文

2011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一章 纲要性附论	1
第二章 马克思的不完整的探索	43
第三章 马克思所知道的黑格尔的著作	93
第一节 居于中派的黑格尔与马克思	93
第二节 1837 年的信和博士论文	129
第三节 马克思与《莱茵报》	164
第四节 马克思对批判的发展及其与黑格尔的分离	207
第五节 《精神现象学》与资产阶级的颠倒的世界	233
第六节 保卫黑格尔	270
第四章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误读	337
第五章 马克思的方法	361
参考文献	380
索 引	393
译后记	400

第一章

纲要性附论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这本书的初衷是描述从 1836 年至 1883 年马 1
克思对乔·威·弗·黑格尔的解读，既包括继承的方面，又包括断裂的方
面。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其他作品分析过马克思整个一生中对黑格尔的
解读。

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是它已意识到黑格尔的文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1) “可见的文献”部分，即在马克思生前所出版的那些黑格尔的手稿，
它们是马克思生前可以获得的，不论马克思有没有读过这些手稿；
(2) “不可见的文献”部分，即那些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不存在的黑格尔手
稿，它们中的大多数在 20 世纪以后才逐渐发表出来。换句话讲，有相当一
部分黑格尔的文献对马克思来说是空白的。

我开始《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的创作起初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
上：我能够解读出包括“可见的文献”与“不可见的文献”对马克思所产
生的影响。解读两部分藏书的方法有所不同：由于马克思阅读过大部分的
“可见的文献”，对于这部分文献的分析就是利用原文进行诠释，而对于那
些“不可见的文献”的解读就是推测性的。既然马克思对“不可见的文
献”全然不知，就只能去推测这些著作可能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尽管这
种推断的方法具有主体性，但我仍坚持认为这些关于“不可见的文献”的
知识对于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读非常重要，其原因有两个：(1) 马克
思理解黑格尔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不知道的黑格尔的思想决定的；
(2) 20 世纪对黑格尔研究的复兴，总的来说是因为受到了黑格尔的那些

“不可见的文献”的出版的促进，通过出版黑格尔的文本——这些文本修正了 19 世纪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解释，并且这些文本表现出这样一个哲学家，即他关心那些同样吸引着马克思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革命性地改变了之前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评价。这个“不可见的黑格尔”在某个领域建立了一个“兴趣的共同体”，而不是得出一些必然的结论，正是这些共同的兴趣将黑格尔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

2

马克思研究事业除了得益于 20 世纪才出版的“不可见的文献”，还得益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 *MEGA2*）的出版。^[1]“不可见的马克思”的文献也被揭示出来，特别是那些记录了马克思勾画《资本论》的结构体系的笔记本、马克思的那些准备材料以及《资本论》（第 1 卷）的最终草稿的手稿都得以为人所知。尤其是在《资本论》（第 1 卷）的早期纲要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论的借用，即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方法论范畴的吸收变得更为明显。除此之外，*MEGA2* 还出版了青年马克思在 1836—1848 年的手稿、摘录和书信，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本书所关注的内容。

MEGA2 的出版也使得马克思的两个原本存在的文本被取消了，即之前被称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两部著作。我有必要对这两部著作的取消做出说明，因为在本书其余部分中我将不再使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书名，而改用“手稿”，并且也不再使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书名而改用“莱比锡宗教会议”。

主张不再将“手稿”视为一部专著主要是基于尤根·罗扬（Jürgen Rojahn）的工作，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2]从事 *MEGA2* 的编纂工作。罗扬运用大量文献学技巧证明了“手稿”并不是一个有着共同主题、联系紧密的文本，而是马克思的一些分散的草稿、笔记、评论和个人练习的汇编，之后由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jaszanov）将这些材料进行拼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手稿。本书后面的部分和章节将提供更为详细的关于“手稿”的文献考据学解释。但是在这里我想提醒读者的是：虽然我认同罗扬关于“手稿”的大多数章节应拆分这个观点，但我本人主张将手稿中标题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部分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我认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展现出完全独立且连续的主题，既不模糊也不矛盾，由此成为一部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由两部分组成：“I. 费尔巴哈”章和“莱比锡宗教会议”，它首次出版于 1932 年，刊登在 V. V. 阿多拉茨基（V. V. Adoratskij）主编的 *MEGA1* 中。关于“I. 费尔巴哈”这章，特雷

尔·卡弗 (Terrell Carver) 和英格·陶伯特/汉斯·佩尔格 (Inge Taubert/Hans Pelger)^[3] 最近的研究证明,“I. 费尔巴哈”从未存在过。它绝对不是一个连贯的文本,而是梁赞诺夫将马克思所做的一些分散的评论以及页边空白处所作的笔记拼接成的单独的一章。因此,“I. 费尔巴哈”的消失不会影响到“莱比锡宗教会议”。《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不是一个哲学探索,它不试图参与“I. 费尔巴哈”或是“莱比锡宗教会议”的解构,并且,完整的“莱比锡宗教会议”的 *MEGA2* 还未出版。因此,我并打算进行文献学上的争论,并且在本书中,为了以“莱比锡宗教会议”为题进行讨论,我将把标题为“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这两部分包括进去。尽管阿多拉茨基从一开始就已将“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两部分一起纳入“莱比锡宗教会议”中,而我也认为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确实展现出共同的哲学目的,可以被视作传递着共同信息,因此在本书剩余部分中我将把这一专著等同于“莱比锡宗教会议”。

3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联系要从可见与不可见的文献中去探寻,正因如此,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必然要从 *MEGA2* 之前和之后的参考文献框架中去认识。*MEGA2* 开辟了解读马克思的新纪元,而这也是重估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新纪元。《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将从档案的角度,将“可见的黑格尔文献”与如今在 *MEGA2* 中揭示出的“可见的马克思文献”进行比较。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的出版不只改变了之前对两人学术联系的解读,也为我提供了过于丰富的重要资料来源。尽管我对于可以拥有如此丰富的材料感到满意,但显然我很难令人满意地在一本书中将两人 1836—1883 年的大量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文献进行比较。为了对两人的学术联系做出令人满意的最深层次的探究,我有必要将研究的时间段限定于 1836—1848 年,这既是一个可以把握的时间段,也是当前文本研究的时间界限。我将不讨论《共产党宣言》,因为它不能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联系——即本书关注的中心——提供任何参考,并且它主要是马克思投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一个序幕,而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在其 1850—1883 年这段时间的主要关注点。1849 年是马克思学术发展的真空,因为他在这段时间正从比利时迁往伦敦。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不打算深入考察黑格尔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本书不研究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伊曼努尔·康德、约翰·费希特、巴鲁赫·斯宾诺莎或弗里德里希·谢林对黑格尔思想形成的影响,也不研究他的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可能性,或者说它作为逻辑工具的合法性。本书既不致力于罗列卡尔·罗生克兰茨 (Karl Rosenkranz) 一鲁道夫·海姆

(Rudolf Haym) — 威廉·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 乔治·卢卡奇 (Georg Lukács) — 奥托·波格勒 (Otto Pöggeler) — 路德维希·希普 (Ludwig Siep) — 克里斯托弗·亚莫 (Christoph Jamme) — H. S. 哈里斯 (H. S. Harris) — 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 (Rolf-Peter Horstmann) — 迪特·海因里希 (Dieter Heinrich) 这些学者对黑格尔的解读史, 也不试图去描绘黑格尔为他之后的欧洲与美国的哲学打上的印记。本书不致力于探寻黑格尔学术的内在演进过程, 以说明《耶拿笔记》(Jenaer Notebooks) 中的青年黑格尔与《法哲学》中的成熟的黑格尔之间的断裂。

本书既不准准备书写黑格尔的全部著作的发掘和出版史, 也不打算介绍或详细说明黑格尔的手稿如何以及何时被发现和付印的。本书也不提供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学的解释。然而, 既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要详细考察 1836—1848 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解读, 我会标明在此时间期限内马克思能够看到的黑格尔的著作或不可能看到的黑格尔的著作。如果不清楚在 1836—1848 年这段时间内马克思在黑格尔全部文献中能获得哪些或不能获得哪些, 那么想要对马克思对黑格尔解读的历史做一个完整的说明是不可能的。

4 对于那些对青年黑格尔作品出版年表感兴趣的人, 我建议他们去看吉赛拉·许勒尔的文章《黑格尔早期著作年表》^[4]。

我的工作目的是重建马克思对“柏林的巴门尼德”的解读。我之所以把“柏林的巴门尼德”作为黑格尔的同义词来使用, 是因为黑格尔认为巴门尼德是第一个发现“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5]的哲学家, 并且黑格尔将这一概念借用过来作为他自己的哲学的基本原则。另一个我将作为黑格尔同义词使用的是“老师”(The Master)。我将这个词作为黑格尔的同义词是借用马克思的概念, 因为马克思在他的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博士论文^[6]中把黑格尔称作“老师”。我在下文中将对黑格尔的著作做一个摘要, 并把这个摘要作为马克思所描绘的黑格尔形象的背景资料。

当代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哲学讨论分为两个阵营: 继承派和断裂派。继承派的支持者们看到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 尽管并非在所有领域; 断裂派的支持者, 如路易·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则坚持认为两人之间存在着断裂。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空白, 并且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很多方面都进行了错误的解读, 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仍属于继承派, 并证明这一论点: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 并且最重要的是继承了他的方法论工具。我最近写的书《不同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就深入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史》和

可以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7]中找到的他对黑格尔的这部著作的解读。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1) 他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1836年至1848年；(2) 他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1850年至1883年他去世之前。只有这样划分才能描绘出这两个时期的差别，并且我推荐读者参考我在《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这本书中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更深入的分析。^[8]然而，我希望能告知读者《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两本书的观点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在《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中，黑格尔是被作为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9]但是，在对黑格尔的政治学进行了更持续深入的研究后，以及在 K. -H. 伊尔亭 (K. -H. Ilting) 关于黑格尔的政治理论研究工作的帮助之下，我改变了我的这一观点。“老师”是作为一个具有洛伦茨·冯·施泰因 (Lorenz von Stein) 与卡尔·奥古斯特·哈登堡 (Karl August Hardenberg) 传统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呈现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中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期间，他首次吸收黑格尔在那些年中所出版的作品。他第一次对黑格尔的借用是从1836年到1848年，在这12年中，1836—1844年这段时间最为重要。在这几年里，马克思于1841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3年创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同年还创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后在1844年创作了一部手稿，其中包含题目为“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的子文章，在马克思创作这些作品时，他深入研究了当时已出版的黑格尔的著作。马克思在《神圣家族》(1845)、“莱比锡宗教会议”(1845—1846)和《哲学的贫困》(1847)这三部著作中继续对黑格尔的哲学发表评论，但这些评论都是对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思想的思考、运用和批评，而不再是一种原发 (initial) 研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主要是关于黑格尔的劳动理论和异化理论。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这次借用，亦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吸收和消化阶段，于马克思离开比利时去往伦敦定居期间的1849年结束，因为在此期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经历了一次转变。

本书主要讨论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期间。然而，尽管1836—1844年这段时间非常重要，但我还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学术兴趣在1843年10月经历了一次转变，即向政治经济学转变。1843年10月马克思前往巴黎参加了德国工人运动的会议，与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讨论了经

济学和黑格尔，同时也开始将他的学术重心从哲学转向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关于马克思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传统解释往往将其与他在1844年初阅读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联系在一起。我打算修正这一传统的解释，我认为马克思阅读穆勒的作品之前就阅读过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著作。马克思在1843年阅读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而我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恩格斯在他为《资本论》第2卷所写的“序言”中做过如下声明：“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10]另外，直至1843年底，马克思一直在研究自由贸易的问题，这也初步标志着他投身于经济学研究。在他的那篇关键性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评了保护性关税。这篇文章写于1843年底到1844年初，并且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还批评了李斯特。^[11]最后一个依据是，马克思在1859年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自己证实了他是在1842年至1843年第一次转向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对自由贸易和保护性关税的争论的研究。在那篇“序言”中，马克思写道：“……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2]因为李斯特的书中持保护主义的观点，我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证明了他在1842年至1843年为《莱茵报》撰稿期间阅读过李斯特的书。关于马克思了解李斯特的时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说法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证明了马克思在1843年底前就读过李斯特的书。因此，在确定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缘由问题上，我将最初的动因归功于李斯特。

“手稿”是零散的探索和个人练习，是马克思关于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特别是劳动理论与异化理论）与斯密的《国富论》以及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的一种初步的思考。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是从1848年到1883年，这次借用他由对黑格尔的吸收转向了对黑格尔的运用。

- 从1848年开始，马克思把他的所有精力都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
- 6 开启了他走向《资本论》这部巨著的旅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具体方案形成之时，即在他所开创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之时，他都将黑格尔的逻辑体系作为框架，运用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重新定义。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主要是关于对黑格尔方法论的运用。